

从革命到合作：中国外交战略60年6大变化

邵峰

摘要：中国领导人对中国的国家身份的认知经历了从革命性国家向现状性国家的转变，其对外战略目标和手段的变迁包括：从理想主义的革命目标到现实主义的发展追求，再到建立和谐世界的宏伟蓝图；从建立国际统一战线思想到独立自主的、不结盟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对外开放政策，再到作为负责任大国的积极参与和推动国际合作等。

2009年是新中国60年华诞，值此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回顾和反思当代中国外交战略所走过的历程特别是其中的巨大变化，无疑对中国外交的认识和未来更大的成功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从国际战略的构成要素的角度出发，笔者将从六个方面探讨中国外交战略的发展和变化，以期勾勒出一个中国外交思想发展的清晰脉络。

一 对时代主题的分析：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认识的根本转变，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及战争与和平这两种力量的消长情况，提出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从60年代开始，由于国际国内多种因素的影响，毛泽东对战争爆发可能性的估计越来越严重，以致得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判断。显然在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上，对战争的估计过于严重。

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通过对世界形势和国际格局的深入观察，以及对当今人类社会阶段特征的透彻分析，明确指出，当前世界的主要发展趋势是和平与发展。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的正式转变。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论断，反映了当今世界发展变化的本质特征，为我们党和国家调整对内对外政策，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决策依据。

江泽民全面继承了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问题的思想，并且把合作与之联系起来。2001年5月，江泽民在第三届亚欧外长会议致辞中强调指出，要和平、求稳定、谋发展、促合作是当今时代的潮流，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意愿，也是亚欧人民的奋斗目标。今天，和平、发展、合作已经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旗帜。

二 从对外战略理念的角度看，中国的外交思想经历了从毛泽东“斗争哲学”到邓小平“发展哲学”的转变，再到胡锦涛“和谐哲学”的发展。

秦亚青教授认为，战略文化可以划为两类：冲突型战略文化和合作型战略文化。中国的主导战略文化正在经历着再建构的过程，其最根本的变化，就是从以强调斗争为核心的战略观念转变为以趋于合作为核心的战略观念。^①

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是从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问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严重对立的情况下，和平仅是长远的奋斗目标，建立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和坚决斗争是争取和平的最重要手段。邓小平和江泽民的“发展哲学”，是从发展的观点看待问题，和平不仅是目标，而且和平基本上是一种现实的条件，发展才是硬道理，自身的发展成为主要目标，

^① 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第11—13页。

改革开放成为发展的主要手段。胡锦涛的“和谐哲学”，是从负责任和共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在和平发展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重要成就、综合国力得到巨大提升的基础上，与各国一道共同努力构建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成为中国追求的国际目标，积极、负责任的参与和推动国际合作是主要的手段。^①

三 中国领导人对中国的国家身份的认知经历了从革命性国家向现状性国家的转变。

国家身份决定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决定国家的对外政策。国家身份指一个国家相对于国际社会的角色。具体地说，国家身份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与主流国际社会的认同程度。根据这种身份的定义，世界上的国家相对国际社会而言可以大致分为现状性、游离性和革命性三类。现状性国家希望维护国际社会的基本现状，游离性国家根据自己的好恶对参与国际社会的行为进行取舍，而革命性国家则希望改变国际社会的基本现状。^②

从总的历史发展看，中国的国家身份定位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1949年至70年代初，中国的自我身份定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亚非拉地区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革命斗争的一个榜样，是世界无产阶级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言人，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大力支持亚非拉革命。很明显，中国当时是一个具有比较明显革命性的体制外国家。

第二个时期从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中国从基本隔绝于国际体系之外开始初步参与国际体系，中国外交政策中的革命性特征和意识形态色彩逐渐淡化。到了80年代，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人，提出了“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主题，将中国定位为“发展中国家”。这样的身份定位使中国一方面在政治上继续与第三世界国家保持一致，另一方面更有利于加强与西方国家的经济政治往来。这种改革者的姿态赢得了西方国家的认同，而对外开放则表明中国已经开始改变自外于国际社会的立场。但这时的参与还只是个别的、有选择的、被动反应式的参与，主要表现在经济贸易一些领域和安全机制上的被动应对、以双边为主的活跃外交等方面，总体上看表现出游离性国家的特征。

第三个时期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90年代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以及随后全方位开放的对外战略的逐步确立，中国明确了自己“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这一身份定位，使中国在坚持自己的社会主义国家身份的前提下实现了与全球主流的经济体系之间的契合。中国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全面参与各种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的活动，在地区乃至全球事务中的建设性作用不断增强。江泽民的“新安全观”、“负责任大国”思想，胡锦涛的“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等思想的提出，彰显了中国作为现状性国家的本质特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完全认同现有的国际秩序，而是主张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对一些不合理的、不公正的制度进行渐进的改革和创新。这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综合国力日益提高和广泛参与国际体系的时期，逐渐表现出现状性国家和体系内负责任大国的特征。

四 中国外交战略从双中心到单中心的转变：正确处理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

总体来看，1949年以来，中国的外交战略经历了两大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到70年代末，主要以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为其价值取向，体现出双中心的特征，在某些时段，不适当地将意识形态考虑凌驾于国家的安全和经济利益之上。在

^① 详细论述参见拙文《和谐哲学：中国外交的新境界》，载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与世界观察》，2008年第3、4期合刊，2008年12月。

^② 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第10—11页。

今天的认识水平下，自民族国家体系诞生的时候起，国家利益无疑是任何国家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决策依据和最终归宿，它理应占据中国外交的唯一中心地位。但是在新中国发展的前20多年，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和中國革命历程决定了中国外交对意识形态的倚重。国家利益在我国并非理直气壮的话语，人们很容易把它与狭隘的民族主义牵扯在一起，国家利益的概念被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理想所压制，意识形态的考虑在中国对外战略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是由于国家利益是一种客观存在，任何国家的领导人即使没有或者不敢使用这个理论概念，在外交行动中也会自然而然地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这就造成了新中国早期领导人在外交思想和政策中的价值取向存在着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双中心的情况，在两者一致时自然好，但是当两者之间出现对立乃至冲突时，中国的外交政策不可避免地受到干扰和挫折。例如，50年代末，由于中苏关系变化，新中国对国际战略进行了第一次重大调整，放弃了“一边倒”，采用了“反对帝修反”、用“两个拳头打人”的战略。这一意识形态色彩最浓、革命性最强、最偏离国家利益要求的国家战略。由于推行世界革命，导致我国在国际上树敌太多，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第二阶段是从70年代末至今，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国外交理念日趋成熟，最终实现了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并重的双中心到国家利益单中心的转变，国家利益成为中国外交的主要价值取向。同时，与意识形态相联系，中国外交一直注重政治利益而忽视经济利益，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强调经济利益，把国家安全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邓小平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是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邓小平对国家关系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对国家利益的深刻理解，是对中国外交思想的一个重大突破，反映了我国国际战略和外交思想的根本性变化。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历届政府自信沉着，坚持以中国的国家利益为中心，兼顾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准则，历经风雨而始终保持着正确的战略航向，为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创造了稳定有利的国际环境。

五 中国领导人对国家利益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隐性到明确再到发展的演变过程，对其内涵和外延的理解不断丰富和深化。

在毛泽东时代，国家利益处于隐性状态，国家利益的核心就是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安全。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国际环境的变化，邓小平明确了国家利益是制定外交政策的最高准则，并发展了国家利益的内涵，增加了经济发展利益的新内容，即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争取创造有利于改革和发展的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力争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江泽民在国内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和国际环境变化的条件下，进一步发展了中国的国家利益思想，在主权和领土安全、经济发展利益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中国的形象利益（或者说责任利益），也就是中国要在亚太区域发挥积极的、逐渐上升为主导性的影响，努力成为全球范围内有影响力的、被公认为起建设性作用的体系内“负责任大国”。此外，新安全观的思想也拓展了中国国家利益的内涵外延，非传统安全开始受到关注。胡锦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系统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把以人为本放在核心的地位，要求中国外交工作按照外事为民的要求，适应我国企业和人员大量走出国门的新形势，依法维护我国海外机构和人员的安全和合法权益，并且依法维护华侨华人及港、澳、台同胞的正当权益。至此，中国的国家利益的内涵已经包括了安全利益、发展利益、形象利益、企业利益、个人利益，外延从横向来看覆盖了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从纵向来看则从政府利益扩展到企业和个人利益的层面。

六 中国对外战略目标和手段的变迁：从理想主义的革命目标到现实主义的发展

追求，再到建立和谐世界的宏伟蓝图；从建立国际统一战线思想到独立自主的、不结盟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对外开放政策，再到作为负责任大国的积极参与和推动国际合作。

为了践行和谐世界的伟大理想，积极、负责的参与和推动国际合作成为主要取向，中国对外战略的途径和手段更趋丰富和多样化，具体可总结为：

第一，中国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由中国的文化传统、发展需要和国家利益所决定的。走和平发展道路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要维护一个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这是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二是中国用自己的行动在构建一个公平、合理、和谐的世界方面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①

第二，中国要做负责任大国。做负责任大国不仅是国际社会对日益强大的中国强烈呼吁，而且也是中国外交的题中应有之意。江泽民和胡锦涛认识到中国的实力和地位显著提高，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世界影响都要求中国发挥与自身实力相称的负责任大国的作用。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强调中国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和义务，积极参与维持和平、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促进共同发展的国际活动。中国已经初步展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国际形象。从处理国家利益和国际责任的关系来看，中国的对外战略思想表现出越来越协调、平衡、良性互动的特征。

第三，坚持共同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方针。胡锦涛继承了邓小平“发展哲学”的主要思想，并对发展的内涵进行了丰富和扩展，从追求自我发展跃升到共同发展的新境界。中国领导人站在历史与战略的高度，眼光从中国扩展到整个世界。中国的发展不是其他国家的威胁，而是世界发展的一个巨大的历史机遇。同时，“和谐世界”理念，不仅强调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友好与合作，而且关注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和谐发展。

第四，奉行多边主义，在各种国际机制和国际事务中积极推动国际合作。中国的对外战略以合作为主线，在坚持和平、发展的基础上，更强调合作的重要性。促进并维护和平、谋求合作、争取平等共处、实现共同发展，成为中国外交的本质。中国坚持奉行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的立场，主张加强对话、增强合作，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全球性问题。从中国外交的发展历程看，中国对多边外交的重视程度总的来讲是呈上升趋势的，目前，多边外交已成为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②

第五，越来越重视软实力的作用。软实力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都将提高国家软实力作为重要的发展战略。在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中国越来越认识到，作为一个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大国，要想在世界上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和发挥应有的国际影响力，仅有硬实力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建设自己的软实力。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改革开放战略推动了中国的持续发展，中国的发展模式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提高了中国的软实力。“和谐世界”概念的提出也是这方面的一个创新。笔者认为，“和谐”的内涵非常广泛，不仅包含和平、合作，而且还包含协调、互助、平衡、共进等意蕴。“和谐世界”与“和平世界”相比，在境界和要求上都上了一个台阶。“和谐”具备成为普世价值的巨大潜力。这是中国对世界的一大贡献，也是中国在“硬实力”获得巨大发展后“软实力”增长的表现。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室主任）

^① 张蕴岭：《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年11月8日。

^② 参见尤洪波：《中国的多边外交》，载《经济与社会发展》，2009年第2期。